



亚洲艺术、宗教
与历史研究丛书

行观中国

——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

朱莉丽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明代中日关系的影响”（项目号10YJC770129）

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2011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日本人对明朝认识的变迁”



亚洲艺术、宗教
与历史研究丛书

行观中国

——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

朱莉丽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朱莉丽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0074-7

I. 行… II. 朱… III. 中国历史-研究-明代 IV.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3566号

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

朱莉丽 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4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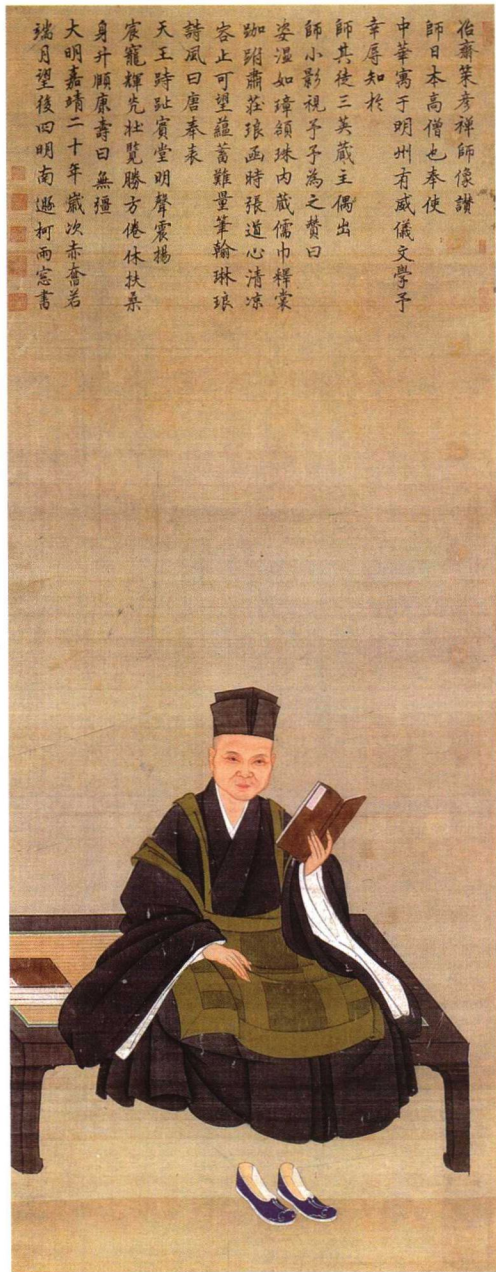
201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074-7/K·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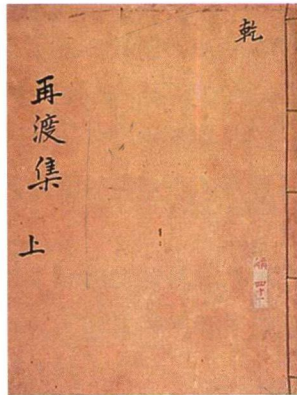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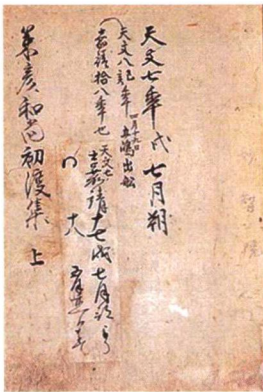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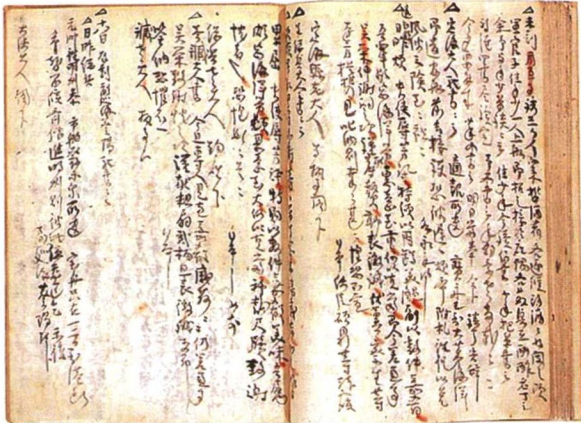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都妙智院藏 柯雨窗贊《策彥周良像》



妙智院藏策彦周良亲笔本《初渡集》、《再渡集》书影
 引自《圣地宁波——日本佛教1300年的源流》
 (『聖地寧波:日本仏教1300年の源流~すべてはここからやって来た』)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

编辑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有关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尤其鼓励跨越艺术、宗教与历史多领域进行综合研究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著作。

二,本丛书收录有整体结构与完整内容的中文学术著作,同时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但不接收论文集。

三,本丛书所收专著,应当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具有现代学术著作的形式。注释采取页下注,书后需附《参考文献目录》,如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则更为欢迎。

四,本丛书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辑的学术丛书,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负责邀请匿名审稿人,对收入本丛书的著作进行评审。

五,本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2013年9月

序

如果重新观察 16 世纪的东亚,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西洋人来到东方并且带来西洋震撼之前,东亚自身其实也在酝酿着变化。在经历了“蒙古袭来”、改朝换代、内部冲突等一系列变乱之后,15 至 16 世纪的东亚诸国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东海周缘区域似乎又有相对平静的秩序。明太祖凭着一厢情愿确立的朝贡或册封体制,表面上也得到了承认,在 15 世纪第一年(1401),连久不通好的日本,其统治者足利义满也试图以“准三后”的名义上书“大明皇帝”,献上各种礼品表示友好,祈求通商。但是,毕竟前两个世纪来经历了太多变故,各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已经悄然兴起。这个时候的东亚,既不再有气势撼人的汉唐,也不再有富庶优雅的宋代,汉族传统中国已经失去了对东亚绝对的文化指导力,因此,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文化比赛的潜流,维护自尊的心情,在渐渐撕裂着这个曾经多少有一些文化同一性的区域。

或许,很多历史学家愿意研究充满着动荡、颠倒、变乱的时代,也愿意研究大开大合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嬗变,这种时代让学术有用武之地,大的变局让历史更激动人心,学者们可以在纷乱复杂的线头中清理出历史的脉络,在波动汹涌的变乱中写出激动人心的故事。可是,很少有人愿意从平静如水的时代,去琢磨水下的暗潮汹涌(其实那个时代也有倭患的不平静,但是,比起前朝的蒙古袭来,和此后的壬辰之役,再后来的萨摩藩攫取琉球,那个时代的东亚海域,秩序还算是相对稳定的)。我以为,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变化,也许在历史文

献中显而易见,但这些变化之前的文化转移,却不那么容易水落石出。可是,朱莉丽的这本书讨论的是策彦周良这样一个人物和他的《初渡集》,而这个人 and 这部书涉及的只是16世纪中叶的中国,这个时代并没有那么多的变动,也没有那么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人、这部书、这个时代,也许可以看到一些微妙的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主题,正如作者所说,是那个时代东亚诸国的互相观看和重新认识。

策彦周良第一次出使大明,是1539年,这一年是嘉靖十八年,日本天文八年。凭借这次访问大明的经历,他写下了这部《初渡集》,其中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朱莉丽博士这部书讨论的,就是这部《初渡集》中所呈现的中国(大明)。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强调,由于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熟悉,他们的笔下也许往往会表现出“日用而不知”的忽略和淡忘,但外国人却不同,他们初来乍到,对一切都好奇,尤其是对于新鲜、陌生和异样的(与本国相比较而言),他们会格外注意观察,往往会浓墨重彩地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就从异域之眼补充了中国的自我认识,也呈现了不同国家的文化比较,特别是,如果这种观察背后还有外国人的好恶、情感和想象,呈现了“他者”的立场,它的史料价值就更高,这就是我一直提倡“从周边看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域外有关中国的文献”的整理的原因。

朱莉丽在这部著作中,曾经说到,“遣明使活跃的室町到战国时期,恰恰是日本和中国从共享一个文化圈,到逐渐走向分离,壁垒愈加清晰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这种文化上的逐渐走向分离,最明显地就表现在诸国往来人士彼此观看之中。日本学者曾经把这些互相观看的资料叫做“异国情报”,在交通不太方便的传统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异国情报”,总是既有实录,也有传闻,也有想象,还有知识,这种实录、传闻、想象和知识,不仅构成传统时代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判断基础,也形成东亚各个文化体之间彼此影响的情感因素。尤其在各国彼此戒备,互相文化存在竞争的时代,这种“异国情报”就格外具有历史价值,因为它不仅能够观察对方,也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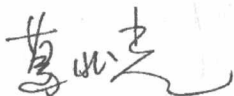
着自我。日本对中国是这样,朝鲜对中国是这样,那个时代中国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认识同样也是这样。

在这些彼此观看和想象之中,亲历异国的人的记载最为重要,因此特别值得研究。最近这些年,李朝朝鲜的《朝天录》和《燕行录》,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可是,与李朝朝鲜时代相近的日本有关中国纪行文献,包括本书所讨论的《初渡集》和同作者的另一部《再渡集》,在中国却还没有太多的研究。原因何在?或许正如朱莉丽所分析的,可能有史料获取方面的困难,或许也有研究论著获取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研究这一领域,必须对策彦周良以及16世纪中叶日本与中国两方面历史、文化、制度等等知识有一定的积累。朱莉丽博士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注意到了各种抄本和版本的对比,注意到了东亚诸国对于中国观察的对比,也深入和细致地讨论了在这部《初渡集》中所呈现的明代朝贡制度(第三章)、嘉靖时代中国宁波的城市与生活(第四章),明代中叶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第五章)。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实际执行的制度”也许与“文本记录的制度”有差异,日本人看到的宁波城市与生活现场,可能与官方史书和地方志的事后记载有差异,而同时代一个外国佛教徒观察到的宗教现象,也就像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看到的一样,不是隔了许久的历史追忆和历史书写,而是活生生的观察,虽然他除了有一个异国的眼睛,还有一个异国宗教信仰者的视角。

有一点感想,我想也在这里再说一说。明清两代,至少在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大体上是通过(一)来华僧侣与商人的记录,(二)唯一有邦交关系的朝鲜作为中介,和(三)询问中国贸易船的船员这三个途径获得的。朱莉丽书中所说的策彦周良等人,就是第一种异国知识的获得者,那个时候,由于往来的局限,日本对中国的情报并不那么畅通,可能曾经导致日本对中国的形势误判或消息滞后,但是,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岛国日本对于大陆中国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明清对于“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在日本,由于那些通晓汉文的僧人、商贾和翻译,常常成为异域

知识的记录者，他们细大不捐地记录着中国方面的种种消息(情报)，虽然有误会也有讹传，但毕竟消息不断，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通航一览》等文献中看到种种记录。然而，同时的明清中国，相比之下似乎关于日本的消息却少得多，尽管明代发生倭患时期，也曾经有过短暂关注日本的时期(如郑舜功、侯继高、薛俊的撰述)，清代也有商人汪鹏《袖海编》那样的亲身经历记载，但相比之下，明清两代中国的异域记述，似乎都来自文人士大夫，而文人士大夫们对于日本的认识，却仍然常常依赖于各种传世史书中的各种《东夷传》、《倭国传》、《日本传》，这些主要来自传世文献的知识陈陈相因，辗转沿袭，甚至还会掺进来自《山海经》式的傲慢和想象，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清代后期(如黄遵宪)才有所改变，这是为什么呢？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历史上的国际知识不对称状况，给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带来了什么影响？

朱莉丽博士曾在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东亚历史与文化交流的研究，并且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前些年她来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这部书就是在她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原本我一直建议她邀请陈尚胜先生来撰写这篇序言，但她认为这篇论文的蓝本是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理应由作为博士后合作导师的我来撰写。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犹豫很久，才勉强动笔来写这篇序文，也许有些画蛇添足，也许有些文不对题，但我仍然恳切地希望读者，能够认真地看一看这部书，因为朱莉丽博士呈现给我们的，是五百年前一个日本僧侣兼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这是一个来自“他者”的观察。



2013年9月12日

目 录

绪言	1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角度	1
二、学术界研究概况	9
三、史料状况和研究思路	18
第一章 《初渡集》的产生背景	
——16世纪中叶的日明通交概况	31
第一节 日本和明朝国交的展开——遣明使团的发展轨迹	31
第二节 五山禅僧与遣明使团	35
第三节 策彦周良的出使背景	41
第四节 受命使明与遣明船的筹备	45
第二章 《初渡集》中所见之遣明使朝贡路线	50
第一节 桴海而来——从博多到昌国	50
第二节 海上迎客——从昌国到宁波	57
第三节 大运河之旅——宁波、京城间	64
小结	84
第三章 由《初渡集》所见明代朝贡制度之一侧面	
——以嘉靖年间对日本贡使的接待为例	85
第一节 宁波登陆后的交涉	85

第二节 日使上京朝贡途中的待遇	111
第三节 京城朝贡与明廷的应对	120
小结	158
第四章 策彦笔下的宁波城市和城市生活	161
第一节 策彦周良笔下的宁波城	162
第二节 策彦周良在宁波的文化活动	172
第三节 《初渡集》中的江南文人日常生活	181
小结	203
第五章 《初渡集》中的明代宗教与民间信仰	205
第一节 策彦笔下的明代佛教——以寺院为中心的分析	211
第二节 策彦周良笔下的嘉靖年间道教	239
第三节 《初渡集》中的明代城隍信仰和天妃信仰	243
第四节 策彦周良眼中的明代先贤崇拜	252
小结	260
余论 域外看中国	
——再论《初渡集》的史料价值	263
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89

绪 言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角度

前近代的中国由于在经济、文化上相对于周边国家的领先性，长期以来受到周边国家的瞩目。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辐射下的日本、朝鲜、越南诸国，为了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以及更好地发展本国文化，对于掌握中国的情报乃至研究中国十分积极，各国均在了解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国的独特认识。这种认识在 14、15 世纪以后，也就是在朝鲜的李氏王朝、日本的室町时代、越南的后黎朝以及琉球的三山统一之后，随着这些国家加入到明朝主导的所谓朝贡体系内，而开始趋于稳定和系统化。这些国家在朝贡制度下定期向中国派出的使节，记录了他们在中国期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被称作朝鲜燕行文献、日本使节入明记以及越南北使文献等等的史料。这些文献包含了许多关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信息，同时向我们展现出这一历史时期，日、朝、越等国对于中国的不同认识。

相较于从晚明开始趋于丰富的西方诸国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这些同属东亚的国家对中国认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近”，既包括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也包括文化上的接近。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西方诸国对中国的观察就像用相机拍到的远景，那么日、朝、越等国拍到的则是近景，虽然面对的是同一物体，但二者所看到的画面并不同。更何况日、朝、越等国在历史上曾与中国长期共享汉文化，它们对中国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是烙有中国印记的中国式思考。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吸

纳,已然深深嵌入到它们的立场中。所以它们在审视中国的同时,也是在评价自身。通过与作为“他者”的中国的对比来塑造自我的形象是这些国家一直以来的做法。无论是朝鲜的小中华思想^①、日本的日本型华夷思想^②、还是越南在15世纪逐渐形成与大明国“北国”相对应的“南国意识”^③,都是以中国为参照物的。中国对于东亚各国来说,是无法回避的强大他者,因此它们热衷于记录中国、研究中国。而它们的这些记录和研究,又恰恰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照。概言之,这些域外文献的价值在于:

(一) 展现新的视角。葛兆光教授曾讲道,“我们对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由于域外观察者们是将中国当作他者来审视,是从外部看过来,其视角不同于中国人由内部做出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他们观察到的东西不同,记录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域外文献中往往包含了许多为中国史书所忽视的方面。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因为不存在中国正史记载中由于官方压制或粉饰太平所导致的曲笔和隐晦,从而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史书在对外交流这一领域某些记载的缺失。

(二) 开阔新的视野。长期以来致力于域外汉籍整理和出版的

① 《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卷二十,成宗三年七月乙巳条:“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李朝实录》第15册,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1967版,第237页)。朝鲜以儒家思想为依托,认为自己是在文明上仅次于“中华——中国”的小中华,从而使朝鲜产生一种追随于中国而区别于夷狄的文化优越感。

② 日本的华夷思想产生很早,比如在8世纪的史书《日本书纪》中,便有“新罗不事中国”之说,自称为中国,以新罗为西藩。明清鼎革之后,日本认为中国发生华夷变态,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称日本为“中朝(中国)”,而由满清统治的中国则是夷狄。

③ 参见桃木至朗《“中国化”和“去中国化”——地域世界中的越南民族形成史》(「中国化」と「脱中国化」——地域世界の中のベトナム民族形成史),载大峰显等编《地域的理性》(「地域のロゴス」),世界思想社1993年版,第77页。

张伯伟先生指出,“典籍是过去文化的载体,域外汉籍反映了汉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以及在此大语境中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文化的形成。汉文化传播至域外,在新土壤中发生变化和调整。这些被别国吸纳了的汉文化之间的交流造就了许多新的平台。汉文化的向外传播不仅塑造了东亚各国的‘同’,还开启了他们之间‘通’。”也就是说,汉文化圈的交流不只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进行,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间也存在这种交流。譬如朝鲜和日本之间汉籍的流通,朝鲜和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诗文唱和、朝鲜通信使和日本知识人的笔谈等等,作为他们之间沟通桥梁的,正是汉文化。在这些场合中,中国都成为不出场的在场者。这些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国家,用汉语对他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做出了记录。他们所记录的中国,不是像二十四史那样“中国视野里的中国”,而是东亚视野里的中国。

(三) 利用新的材料。中国重视史书编修的传统和士大夫文人乐于经史,勤于著述的品格使得中国拥有着东亚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浩瀚史料。我们在对中国历史的任何一个侧面进行研究时,似乎都能找到非常多可资利用的史料。但这些史料并不足以让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全部。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历朝各代的中国是如何在东亚、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展现其形象时,作为其活动舞台的域外的史料又怎可忽视?更何况,只有把域外的史料纳入进来,我们才能从整体上研究汉文化。中国是汉文化的主流,但仅仅从主流入手仍然不够。数量浩繁的域外史料,势必有助于学人开拓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新领域。

(四) 提供新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比较研究和史料互证一直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在利用域外文献进行研究时,这两个方法能够得到新的延展。史料的互证不仅可以在中国史料内部展开,还可以在中国史料和外国史料之间,以及外国史料和外国史料之间展开。比如对于中国的同一文化现象,日本一方、朝鲜一方乃至越南一方做出了怎样不同的观察和记录?只照一面镜子,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全貌。这种史料互证和比较研究,一方面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的

某些现象提供更为扎实的背景材料,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使得各种史料的特征展现得更为明晰。

概而言之,利用域外文献来研究中国,一则可以开拓研究的视野,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去把握中国历史;二则可以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三则可以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新的史料。

鉴于此,本书主要利用明嘉靖年间两次作为朝贡使节来华的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的出使日记《初渡集》^①展开研究,研究其中所展现出的日本遣明使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及由此折射出的16世纪的日本知识人对待明朝的文化心理。《初渡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是一部十分陌生的史料,甚至在历史学的专业领域它也不是那么的广为人知。提到日本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大多数人的印象恐怕还只是停留在唐代圆仁的那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日关系了解稍微深入一些的人,也许还会想到入宋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

^① 《初渡集》为策彦周良初次出使明朝期间的日记,原本共分四册,京都妙智院所藏的策彦周良手写本的外表纸题分别题以“初渡集上”、“初渡集中”、“初渡集下”、“初渡集下之下”,内表纸则分别题以“策彦和尚初渡集上”、“策彦和尚初渡集中”、“策彦入唐记初渡集下”、“入唐日记初渡集下之下”。无论是各册之间,还是内外表纸之间,名称都不统一,且内外表纸的笔迹又与正文中策彦周良亲笔的笔迹不同。而“再渡集”分上下两册,外表纸分别题以“再渡集上”及“再渡集下”,上册之内表纸题“策彦和尚再渡集上”,下册之内表纸题“策彦和尚再渡集下”。但上册正文第一页有策彦亲笔的“再渡上”三字,下册正文第一页有策彦亲笔“再渡集下”的字样。故策彦入明记的研究专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牧田谛亮先生推测,策彦周良并未给第一次的出使日记命名,只是随便冠以“策彦入唐记”、“南渡集”之类的名字,是后人根据策彦周良亲题的“再渡集”这一名称将其第一次的出使记录命名为“初渡集”。进而又演化出《策彦和尚初渡集》和《策彦和尚再渡集》这两个名称。现存的各抄本、刊本中,两种命名方式都存在。如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明治十八年影写本、明治三十年曲渊启次郎原抄本和经过文科大学令校对的抄本,都以《策彦和尚初渡集》和《策彦和尚再渡集》为名。而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据上村观光藏本在明治四十三年作成的抄本则是以《初渡集》、《再渡集》为名。刊本中,《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丛书四》(佛书刊行会1922年)中以《(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策彦和尚入明记)再渡集》为名收入,而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的研究》(『策彦入明記の研究』(上)(法藏馆1955年)则以《策彦和尚初渡集》、《策彦和尚再渡集》为名收入。本文在正文行文中除涉及版本说明的情况,一律采用《初渡集》、《再渡集》这一名称。

山记》。而对于在明代时来到中国的日本僧人策彦周良所撰写的这部《初渡集》，大多数人不要说是得观其貌了，即便是得闻其名也属少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有着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初渡集》在中国的声名远远不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参天台五台山记》和同时期朝鲜使节的朝天录作品呢？我想一来是受到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既有的研究定式影响，二来是缺乏一个将之引入中国史学界的契机。

众所周知，任何历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都是史料的获取。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参天台五台山记》，还是朝鲜使节的各种朝天录，在中国均已属于常见史料，甚至有数种版本可供选择。比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有顾承甫、何泉达点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本，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在日本学者小野胜年校注的基础上修订校注的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参天台五台山记》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本；各种朝天录有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出版的林基中编订《燕行录全集》中的版本以及珪庭出版社《朝天录》中的版本，近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选编的版本，其中的《漂海录》更是早在1992年就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葛振家先生的点校本。史料前期的整理出版工作做得好，学人们运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相应的研究也就容易展开。而《初渡集》从未在中国出版，策彦周良的手写本由妙智院寄藏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一般人很难一睹庐山真面目。仅有的两个点校本仅在日本出版，且流传未广，可谓花开深巷人未知。其次，朝鲜使节朝天录的数量众多，体例一致，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史料群，对明朝历史和中朝关系有着相对系统的展现，而且其中所体现出的朝鲜使节对明朝的主观评价较为明显，这是一个探讨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事大观念和其自身小中华思想的绝好角度，因此更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而《初渡集》虽然叙事详尽，但少有作者的主观论说。乍看起来平铺直叙，若非细细品读，难窥其价值。因此，与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对朝天录的研究兴趣持续高涨形成鲜明对比——对